

賦話新聞•新聞賦化：報刊「新聞賦」與新聞文本「賦體因子」之考察（1912—1937）

一、引言：「賦體」藉由近現代報刊「破體」

「賦」這一文體並非始自民國，但其流行以至於成為社會上頗具影響力的文體，從「貴遊」走向「民間」，且可以「即時」性的凝聚大眾情感，則是十九世紀以來所特有的文學現象。「賦」在近現代到底具有何種社會功能？它以什麼樣的方式發揮社會影響力？以「賦體」而言，在民國報刊常可見與其它文體交織並置在同一報紙版面，抑或雜誌的專欄之中。更有甚者，賦體為求與時事結合，且欲讓識字之閱讀群眾通曉易懂，有時亦可見賦文擺脫過去宮廷大賦「瑰字儷辭」的典雅華采，而趨向於「俗」。而此「俗」又有清代「律賦」之韻律規則運技於其中，藉以展示文人逞才競技的本領。除了純粹賦作以外，如果不以「賦」為題名，而以一般散文行之，甚至像一般詩歌韻律為文的報刊作品，其中所含「賦」體之成分與因子，也不能忽略。尤其是「賦」之技巧及風格在民國以降，其反應時事，結合傳媒，招徠大眾閱讀、演說，所能帶來的文學召喚及影響，更是不容小覷。

「賦體」在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中，常與其它「文體」產生鉤合影響，許結曾提到：

「因文立體」是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的生成法則，而「因體範文」則是文體論完型後具有指導實踐意義的經典原則。在此兩者之間，始終存在著相反相成的關係，也就是說，文體理論的完熟源自大量而生動的文學創作，而文體論對現實創作起指導功用的同時，又形成對文學創造性新的桎梏，文體論的「完熟」也標誌了文體本身的「衰變」。因此，繼魏晉齊梁文體論「明體」思想隆盛之後，唐宋時期「破體為文」創作風氣的盛行，不僅是文學創作對文體理論的衝擊，同樣也是古代文體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理論環節。……宋元後，中國古代文體理論興起了長達數百年之久的文學辨體思潮，究其原因，一是文學創作至此諸體兼備，需要從理論上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梳理與辨析；二是針對唐宋時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的「破體」風氣的盛行，需要通過「辨體」達到純潔文體，即「尊體」的目的。

許結看到了歷代文學作品，包括「賦」在內，對於求新求變之作者來說，常有「破體」之舉，因此文學批評者（含賦學家）不得不「辨」，由「辨」而「尊」。這樣的文學現象不僅存留在古代，晚清以降報刊興起，加上白話之倡議，對大眾啟蒙之呼籲，文體之間的流動，甚至文／白夾雜之語詞、語式，在世變之時代需求上，本就蔚為大觀。可以說「破體」不僅是過去傳統文人「求新求變」的自我逞才與創獲，同時也是時代「啟蒙」，甚至大眾「閱讀」的需求。

同樣的「破體」情形，即使到了當代，對於「抒情散文」的真實性，以及衍生的散文、小說之界線討論，在各文學獎公布揭曉之際，常也引起諸多詰問及討論。從古代文學來看，無論韓愈的以文為詩，抑或蘇軾的以詩為詞、姜夔的以賦為詞，乃至於現代散文與詩的跨界（所謂散文詩），抑或散文的小說化等。文體運乎於每個作家之手，謹守文體規範界線，顯然不是一個才氣縱橫或充滿創意的作者會甘困於此。同樣的，奠基於現代印刷、電子傳媒的行銷策略，從讀者乃至於大眾化的考量來說，文體的倫理價值顯然也並非市場及商業機制考量下所須遵守。相對的，「創作者」與「讀者」的啟蒙、對話交涉之「詩用」、「賦用」、「文用」等倫理意義，在民國報刊傳媒發達之際，應該更勝於「辨體」所要強化之文體倫理界線。可以說，文學「破體」現象常常也是反映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」的特徵之一。

以民國「賦體」來說，除了傳統文人藉賦文逞才競技、寄寓抒懷，相對的，在報刊我們也看到另一群「知識的中產階級」參與報刊編務，或以報刊讀者身分投書成為撰者，他們的賦文或典麗、或諧謔，為數不少，可惜這些作品對於當今研究賦學的學者而言，相對陌生。許結就曾提及：

從19世紀後期延續至20世紀初的「實學」思潮到「五四」時期「白話文運動」的興起，是古典文學面臨重大變落的階段，賦學也遽然衰落。……到「五四」時期，制度變革勘進於觀念變革，文學界宣導白話文的宗旨就在「廢去古文，將這表現荒謬思想的專用器具撤去」，……作為宮廷文學且長期與王朝選制緊密聯繫的賦體文學，自然在汰除之列。

以許結為代表的一般學界論述，多認為民國以來文／白二分的白話文學倡議，以及白話文學所反映的大眾化、平民化的路線，傳統屬於雅正、駢儷，以及發生在貴遊宮廷文學場域的「賦」因而逐漸衰頹，「與聲勢浩大的白話文運動相比，這只能是旁支別流的微弱聲息」。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？這樣的說詞將文／白二分對立，觀察或有粗略，更重要的是忽略文學的求變竄入其它文體之可能，也就是「賦體」是否存在「破體」之可能。尤其此一「可能」若結合「報刊」，且與時代鈎合，反映新聞時事，這樣的新聞「文體」是否可以帶來耳目一新之感？

## 二、「賦話新聞」：以賦體陳述時事及諷喻

賦體可以反映政治社會之變遷，陳述時事並加以議論，古已有之。章學誠曾指出：「古之賦家者流，原本《詩》、《騷》，出入戰國諸子。假設問對，《莊》、《列》寓言之遺也；恢廓聲勢，蘇、張縱橫之體也；排比諧隱，《韓非·儲說》之屬也；徵材聚事，《呂覽》類輯之義也。」這種結合「假設問對」、「恢廓聲勢」、「排比諧隱」、「徵材聚事」等特色，將從容辭令、莊諧雜出、恣情快意鎔鑄於敘述議論之中的「散文賦」，看似不同於「楚辭之屬」的「騷體賦」，亦似乎有別於詩三百篇之遺的「詩體賦」，然而就像一條大河可以有幾個源頭，一個源頭可以派生出多條江河一般。例如漢賦在體制、內容、風格諸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獨特風貌，可以說是「散文、騷體、詩體」三種賦作淵源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。且在國力強盛政局較穩的時代，往往出現京殿讚頌題材的大賦；而在世變亂世，則更多地出現諷刺賦或抒情小賦。

以民國報刊賦而言。此類結合時事新聞的諷刺題材繁多，例如民國肇建不久的「安福國會」，在選舉過程出現大量腐敗、作弊現象。報刊中有筆名澣香所撰之〈送新議員入京賦〉，以「黑幕揭開，青錢選中」直指是金錢賄選，並勾勒此一買票賄選過程：「當夫新議員之運動選舉也，票價飛騰。應酬周到，證書收拾，支配停勻。或乞援乎本系，或紹介於私親。」；「珍重臨歧，此去惟求安福；統籌全局，個中孰是時賢。縱然笑罵由他，賴金錢而得邀寵眷。」這些議員，胸無治國方針，平日鑽營投機事業，為酒肉之徒：「爾其被選為議員也，志早如鴻尾還附驥。如飛鳥之投羅，如游魚之吞餌。此是投機事業，大欲堪求。本無謀國方針，庸材濫廁，伊誰之力？苟富貴兮毋忘，舉爾所知，惟酒食之是議。」到了京畿之地，不是問政而是去八大胡同逛窯子：「快尋北地胭脂，八大胡同走徧」。這一無心問政，只求聲色縱欲之行徑，透過「賦」更能展現「諷」之特性。在同時期南方無錫的報紙，亦有刊載國會議員的醜態，在〈北京八大胡同迎兩院議員賦〉一文中，撰者寫道：

百妖滅後，萬劫生餘。秋波遠盼，春意重舒。聞君來兮有日，喜妾願之不虛。憶當年解散令頒，去矣而形多蹙蹙。欣此日歡迎會啟，來哉而行莫徐徐。若個老交情，早已巢尋舊壘。者般小標臉，同來果擲香車。胡麻飯把盞有緣，重作天臺之客。桃花源問津得路，勝如武陵之漁。

此篇撰者未署名，或有可能由報社之編輯所撰，代表一種「社論」。從無錫之「地方」揶揄「中央」北京權力核心之議員，藉之表達人民不滿心聲。如果將此對照《益世報（北京）》所載：「議員秋日樂天街夜色涼如水，披衣上坐車，八大胡同帶月遊，哪管議案如山落。」這完全是藉新聞化為文字之諷。

〈北京八大胡同迎兩院議員賦〉開頭即點出這些兩院議員：「方國會之初開也……徵逐胭脂坡下，醉迷錦繡叢中。」諸公們雖然是「一時之雄」，但是「來自田間」，到了「胡同」紙醉金迷之境，「色膽則愈嫵愈大」，每天沉醉在香舍中，「米湯則越灌越懵」。所得薪俸都花費淨空：「五百金月俸支來，悉化作纏頭之費。」整個胡同內熱鬧紛紛都是兩院議員，撰者不禁諷刺「試看四海雙泉熱

紛紛，無非兩院客；卻羨龜頭鼈爪面團團，都作富家翁。」最後不免發出感嘆：「無何國生禍亂，天降鞠凶。民權已厄，帝興方濃」。

「安福國會」的成立是1917年6月張勳復辟，解散民元國會（第一屆國會）。張勳率辦軍三千餘人進入燕京，武裝調停總統黎元洪和閣揆段祺瑞的「府院之爭」，但張勳乘機擁前清宣統帝溥儀登基，人稱辦軍復辟。在〈復辟賦〉一文中提到：「七月一，共和劫。改國體，稱復辟。京畿數百餘里，不見天日。辦軍南衝而北突，附和老張。殺氣沖沖，闖入宮牆。清帝吃驚，太妃痛哭。貽禍沖人，急煞世續。竭力求饒，聲淚俱落。伏地呼號，碰傷額角。淋淋焉，漓漓焉，血不知其幾千萬滴。」這篇標明「仿阿房宮賦」之擬仿作品對復辟事件諷刺十足。不久，張勳部隊旋被段祺瑞打敗，段祺瑞制定新的國會組織法，安福系獲得多數席次。由此可見當時國事如麻，時局混亂。

上述賦作既反映時事新聞，亦能有所針貶，尤其人物形象的醜態描摹，亦如小說家之筆觸。程章燦曾經提到：「傳統賦體文學中有一類抒情賦，以抒發憤世嫉俗之情為主，具有相當強的『咬齧性』，如趙壹〈刺世嫉邪賦〉。還有一類俗賦，以嘻笑怒罵的風格鋪繪世像，詼諧談笑，令人解頤，如〈神鳥賦〉、〈鶴雀賦〉、〈醜婦賦〉、〈晏子賦〉等，雖然未必辛辣，卻也在甜媚之外別有滋味。總的來看，這兩種賦體在二十世紀都鮮聞嗣音。」程章燦所做之「二十世紀都鮮聞嗣音」結論顯然過於武斷。至少就二十世紀初報刊之大量賦作來說，並非事實。報刊當中「抒發憤世嫉俗之情」（咬齧性）以及「嘻笑怒罵的風格」之俗賦比例相當的高，尤其對於政治、社會現實的「疾憤」而導致的「諷刺」，可以說是大眾「輿情」顯現之一環。

錢永祥在《動情的理性：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》曾道：「政治哲學完全是一種理性的活動；惟其說理，才能趨近於更妥當的認知，也唯有靠說理自身內建的普遍主義性格，我們才能平等地考量所有相關者的利害。不過這種理性必然源自『情』的鼓動，也就是因為人間的種種艱辛與苦難令我們感到不忍與不甘，動情之後發為關懷與在意，才能構成實踐的介入。」我們也可以將這樣的觀念移植到新聞賦的作者身上，他們對時事的感懷諷喻，既有新聞的「理性」紀實，但也有更多的「動情」在賦作裡頭發揮。以新聞賦對政治的諷喻來說，〈議院賦（仿杜牧之阿房宮賦）〉將「議員」之貪婪比擬為狗彘之心：

積贖如山，一事均不辦。尸素其間。嫖賭鴉片，金錢酒食，買賣官秩，議員處妙之怡然自得。嗟乎！議員之心，真狗彘之心也。不念中華，但知肥身家。奈何自尊若神聖，狠毒如虺蛇！使包辦大選，貪罔利之奸商。取悅軍閥，賤於倚門之娼女。冰敬纍纍，多於權要之苞苴。奔走保洛，苦於蜀道之行旅。人格墮落，等於賣身之豬猡。清議嘲譏，甚於市人之言語。使中國國民，不敢言而敢怒。議員之位，日益鞏固。南北分，京滬會。一丘之貉，難分涇渭。嗚呼！復議會者，菩薩也，非國民也。驅菩薩者，軍警也，非議員也。嗟乎！使議員知愛中國，則足以抗軍閥，議員擁菩薩，可以制憲法，誰得而侮辱之也。議員不知自哀，而國民哀之。國民哀之，而不棄之，亦使國民而自哀國民也。

無獨有偶的，〈議員抬棺出席賦（以題字為韻）〉（《大世界》1922年11月5日）則用吳地俗諺反諷議員「見錢眼開，死要錢」之醜態。〈安福議員賦（以議員先生死要錢為韻）〉（《大世界》1919年7月23日）從用韻「議員先生死要錢」中，民初國會議員貪婪之狀不言可喻。另〈蟹人賦〉言及：「近閱報紙登載越蘇省議會選舉議長問題，演出許多惡怪現象，人格滿地喪不顧廉恥，吳人目不法行為者謂之蟹人。適值蟹時即以蟹名其人，感而賦之。」以議員寡廉鮮恥橫行如螃蟹，諷刺「一蟹不如一蟹」，十足的傳神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前述諸多對於政治現狀及國會議員醜態之控訴揭露，許多賦作都以「擬阿房宮」的句式為之，包括觀欽〈復辟賦〉（仿阿房宮賦）；文斌〈議院賦（仿杜牧之阿房宮賦）〉；甚至新樹〈登坑賦（仿阿房宮賦）〉所云：「嗚呼！凡登坑者，撒污也，非官也。運動者，官也，似登坑也。」以「登茅坑拉屎」比喻政治上為官者之醜態。這類以「登坑」為名的賦作不少，如不著撰者：〈登坑賦（仿阿房宮賦）〉，《大公報（天津）》，1914年7月16日；不著撰者：〈登坑賦〉，《時事新報（上海）》，1914年8月3日；一塵：〈登坑賦（仿阿房宮賦）〉，《益世報（北京）》，1921年5月15日。

這些仿杜牧〈阿房宮賦〉的作品，誠如陳建華所述：

其實仿作也具相似的功能，當它在報紙中蒙太奇般與天南地北的資訊並列，敘事空間映出全球景觀的鏡像，負載著一種新的思維。……本雅明在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》一文中談到照相的發明造成藝術品的大量複製，雖然仿作即改寫，與照相複製不同，但道理是一樣的，大量〈阿房宮賦〉的仿作，無不聲稱來自於杜牧的原作，遂披上某種古代經典的「靈暈」(aura)，其實也是一種促銷手段。……無論是煙館、妓院、錢莊、女堂倌、鴿母、外白渡橋，或洋煙之害、聘禮之重，凡日常生活的一事一物，都成為仿作的主題。作者的觀感是流動的、碎片的，正表現了波特賴爾所形容的「過渡、短暫與隨機」的都市「現代性」特徵，與「永恆與不變」的傳統並存。作者大多是都市「浪蕩子」，是紙醉金迷的消費者，常以「過來人」的懺情口吻對讀者進行淺薄的道德勸誡。

陳建華所著眼的雖然是近現代「海派文學」的分析，但如套用在這些擬作者的心境寫照，亦相當貼切的可以反映在昔、今的對照之下，「現代文明」雖帶來物質的進步，甚至複製技術衍生的商業行徑，但人心、道德，乃至於期許的政治新貌卻是失落的，仿作背後，仍不無「以古諷今」之根本初衷。

### 三、「新聞賦化」：「賦」之為用的倫理關懷及情感動員

報刊作為傳媒性質，本就常鉤合時事而刊載新聞，並常加以議論。而此議論亦常挾帶傳統史事抒發情志，換言之，賦作中的抒情與敘事亦常有縮合之處。除了政治議題之外，以社會寫實為主的時事情狀，亦在民國新聞賦中有大量著墨。如民國時期上海地區「拆白黨」盛行，所謂「拆白黨」是上海俚語，泛指上海地區一群糾黨並以色相行騙，白飲白食騙財騙色之人。上海《大世界》的〈拆白黨賦〉就寫道：「爾其靚面獻勤，假心討好。一味溫存，百般低小。眼笑眉花，言尖語巧。用一二尊番佛釣玉蟹須要金錢，費千百倍精神。騙珠花，更偷珍寶。」無獨有偶，《新世界》也有〈女拆白賦〉，二文分別在1918年5月與7月發文，顯見當時上海詐騙橫行的社會實況。〈女拆白賦〉寫道：

姘頭已拆一年，拆白心頭自憐。馬路閒宕，嘴裏啣起香烟。瘟生難遇，枉勞腳步幾千。偶有人兮視逼，便與逗兮眼色。人則漸漸入魔，眼則溶溶不測。倘使有意鑽圈，何妨比翼。心戀色而不清，色迷心而不明。況逢著名蕩婦，相對調情。……同借銷魂之榻，高唱合歡之歌。相偎相倚，其樂如何。鬢蓬鬆而漸亂，人困倦而夢爛。竊銀錢而狼奔，挾衣衫以鼠竄。勿好哉！好夢回來恨太遲，杜鵑飛去不知時。幾如剗去心頭肉，木立床中人笑癡。

遇到詐騙，常被話術所迷惑：「人則漸漸入魔，眼則溶溶不測」，然被騙也源自於「情慾」之被撩撥：「心戀色而不清，色迷心而不明」。如此寫實摹狀，也是為了提醒世人避免受騙上當，否則所有慘狀及悔恨，皆已無法平復及挽回，「賦」之為用的倫理關懷亦顯現於作者筆觸之中。

民國許多賦體作品，就新聞時事所聞所見而發之為文，透過戲擬人物，或鋪排誇飾情節之筆法，略微「越界」貼近於「小說」，或甚至結合韻文接近於「戲曲」。展現其通俗之「咬齧性」。如1930年代中國影壇紅極一時的巨星阮玲玉，於1935年3月8日服藥自盡，當時新聞報導佔據各大報版面。如以阮玲玉自殺後三日3月11日上海《社會日報》的報導及評論來說，不僅將相關新聞置於男／女性別之框架來加以品評，且多有所針貶：

從表面上看來，阮的自殺，是出於張達明的訟事。其實他的死，安眠藥片不過是了解他的生命，間接使他壽命的，還是「黃金」與「虛榮」。假使他當初不嫁張達明，不會死；後來不改嫁唐季珊，更不會死。無如那種以摧殘女性為樂事的富翁們，不肯放鬆，不肯使中國有一個完整的女性。所以阮玲玉特在暖烘烘的「三八婦女節」的一天自殺，或者是叫人知道中國的女同胞人沒有踏到光明的境界。

這樣的意見反映了在追求女權的民初社會，一個受制於男人的女性自殺，可說是一種挫敗。同樣的社會輿情也反映在賦作之中，黎明的〈玲玉殉情賦〉中說道：

阮玲玉銀壇驕子，花國名芳。容華絕世，色藝無雙。捧心可擬西子，薄命無殊玉嬙。……乃有海上豪商，江東巨室。銅臭薰天，俗氣千日。慕芳名而進階，託社交以求匹。石榴裙下憑添拜倒之人；明月梢頭，將施偷香之術。若念夫婿之舊情，應始終而如一矣。堪惜牡丹苞含，海棠蕊吐。著意孔方，垂青阿堵。忘却有夫之婦，不復洞口迷津；開方便之門，竟引漁郎入戶。

這裡所用「著意孔方，垂青阿堵」即對於女星貪圖錢財有所諷喻，而「忘却有夫之婦，不復洞口迷津；開方便之門，竟引漁郎入戶」顯然又有「排比諧隱」之情色暗喻。〈玲玉殉情賦〉接著說道：「於是玉容慘識，淚眼溟漾。前夫愧見」，講的是她的前夫張達民。雖然相關報導對阮玲玉之死多有惋惜，但亦有認為阮玲玉「貪財」而致惹禍上身，尤其經過八卦媒體鋪敘，亦多小說家筆觸，使新聞小說化。如上海以女性讀者為核心，知名的《玲瓏》記者報導：

阮素本熱情，自和張達民化離與唐季珊正式同居後，對張仍未稍棄舊情。仍月致津貼百元，共達二年，計洋二千四百元。最近張審知阮深懼訟事，在電影界之地位，又不宜再提過去各事，為盛名之累。乃以控訴方式為要挾，向阮需索萬元，居間人往返談商，阮已允給付四千元，張不允又增至六千元，張仍不允。阮以張迫人過甚，乃憤然曰：彼（指張達民）誠欺人太甚，余今生雖不願與彼對簿公庭，死後必為厲鬼索命。此則為阮死因也。

「乃憤然曰」以下到「死後必為厲鬼索命」，作為不在場的記者，竟能清楚記下阮玲玉與張達民的交涉情狀及所發毒誓，「文學想像」亦是當時新聞報導可見之小說化處理筆觸之一。媒體不止是對某些特定報導的當事人具有意義，它也常被用來作為媒體擁有者的宣傳工具，除了美化或醜化特定個人外，經過報導甚至加以鋪陳渲染，媒體乃至刊載之「文本」更是被整體社會大眾（讀者）所擁有，並與他們的社會生活密切聯結，甚至組織他們的社會生活。可以說，媒體不止是塑造「明星」，它也形塑「公眾」。媒體透過它們的報導建立群眾的社會想像，由此社會想像培養起一般普羅大眾的「公眾意識」，進而可能由此對群眾產生動員的力量。

在報刊賦作之中，牽動大眾情感例子亦時有所見。例如柳穆之〈裸體遊行賦〉描述武漢地區不知從何處而來的一群婦人，在萬目睽睽的注視下裸體遊行，「赤條條一絲不掛」還「相視而笑」的情景：「適從何來，相視而笑。如醉如癡，惟妙惟肖。赤條條一絲不掛，顧影自憐；眼睜睜萬目同睽，容光必照」。若根據報刊同一天並置於版面中，明武所撰之〈漢口裸體遊行之實現〉來當作「互文」對照，明武提及地方政府是明令禁止裸體遊行：「惟漢口當局，未嘗加以贊許，且嚴行禁阻。」然而禁令無效：「但據最近漢口有人來函，則云裸體遊行之際，已於5月4日舉行」。挑選5月4日遊行，從五四作為一個突破傳統的文化符碼以及歷史記憶來說，是有相當程度的「刻意為之」。〈裸體遊行賦〉描寫這些裸體婦女「而乃成群結隊，如影隨形。丰姿綽約，玉體晶瑩。你是摩特兒，竟不顧髮膚身體；我乃偽君子，怎禁得袒裊裸裎。」明武〈漢口裸體遊行之實現〉亦說她們裸體遊行提出的主張是「打倒貞潔主義」、「反對一夫多妻制」等各種標語，並高呼「打破羞恥問題」、「女子再嫁」之口號，參加者以女工及工人之妻女為多。

〈裸體遊行賦〉作者又站在衛道立場，結合《詩經》〈相鼠〉、〈無衣〉、〈野有死麕〉等篇章古詩今用，加以「徵材聚事」並斷章取義：「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。如見其肺，豈曰無衣。有女懷春，說什麼冠裳而治。當場獻彩，那管他父母之遺。」發揮詩教，諷刺這些裸體遊行的婦女沒有禮儀，不穿衣服，文中不直接講見到胸部，而是說彷彿見到肺臟，丟盡父母顏面。

不過，雖然是號稱裸體遊行，但參加遊行的婦女還是下半身有繫一塊尼龍布，也有穿短褲的，以及胸部也不完全裸露，所以稱之為「不澈底之裸體」。據說在1927年（同一年）稍早的三八婦女節，武漢市街就出現過一群裸體女子，他們認為女性束胸是不符合人道主義的，因此要解放束胸。由是觀之，〈裸體遊行賦〉乃是根據五月四日所發生的社會新聞，據以寫成賦作。資訊的傳播在現實社會生活提供了一種參與、觀看的效果，在賦作中提到「你是摩特兒，竟不顧髮膚身體；我乃偽君子，怎禁得袒裊裸裎。」相較於過去傳統社會受儒家道德訓誡所欲建立起的「道德」評判，民

國透過新聞媒介並非要強迫大眾接受「新道德」，媒體更強調的是透過揭露政治、社會的「偽善」、「假道德」，增添閱讀者對於「新聞」的判斷力。換言之，新聞報導其主要更著重於「知」的權利，結合新聞報導的賦作或它文學作品，在渲染新聞時事之餘，才又將「德」的勸誡灌輸於其中（勸百諷一）。

#### 四、結語：「賦體」追求新／變之可能

程章燦曾指出：「從歷史上看，傳統賦體本來也是可雅可俗的，雖然在文學接受史中它留給人們的印象基本上是一種雅文體。尊雅的理論實質是尊重賦的傳統體性，用比較純正的文言，用騁辭大賦或抒情小賦的體式進行創作。」但事實上，突破此一「尊雅」路徑的賦體創作也常以「越界」的方式呈現，甚至趨向於「俗」。尤其到了現當代，「賦」可以兼跨「小說」、「散文」、「詩」……，尤其反映新聞時事的寫作，常又游移在「真實報導」與「虛構想像」之間進行擺盪。

晚清以迄民初，可以看到賦體文學形制、語言特色，如何以「賦體」或其它文體所內含的「賦體因子」，或是文體越界（破體）方式呈現於讀者面前。這樣的多變性，其背後關乎文本閱讀、文人心態和文學觀念等深刻的議題。尤其作者與讀者所交織成的文學文本網絡，不僅是共時性的文學對話交會，同時也是歷時性的與過去既有的文本閱讀經驗，以及在閱讀中所逐步交會的各種不同觀念內涵及文本形態展開對話。就閱讀者所形成新的撰述而言，書寫既是對於過去的回顧統整，也是對未來有所寄予瞻望。可以說閱讀、撰述及文本之間是相互交涉、定義，而賦予了文學與時俱新、求變的意義詮釋。